

捨
軍
人
物
傳

江
地





江 地

捻軍人物傳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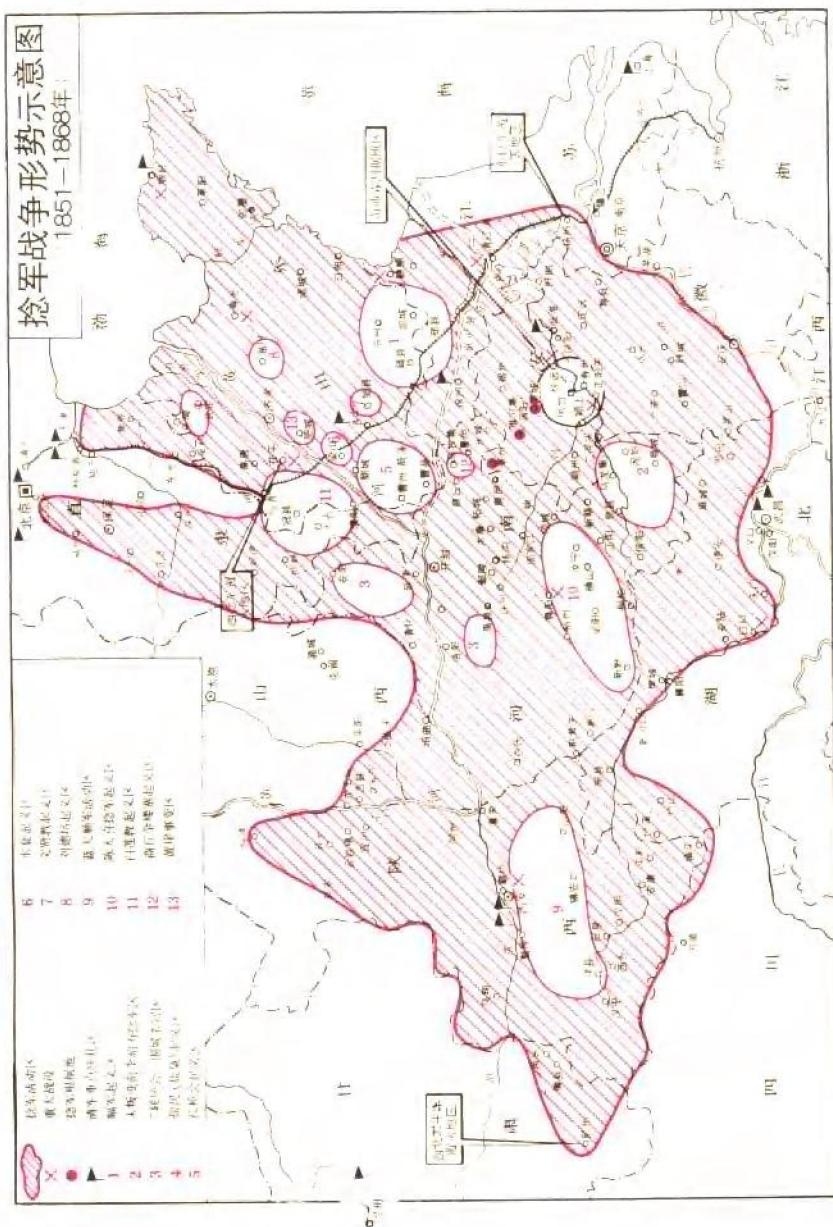
捻军人物传

江地 著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5 字数：185千字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,000册

ISBN 7—80578—213—X
G·211 定价：3.85元



前　　言

这是继《捻军史初探》、《初期捻军史论丛》（二书均由三联书店分别于1956年和1959年出版）、《捻军史论丛》（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）和《捻军史研究与调查》（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）四书以后，作者的第五部也是最后一部有关捻军史的著作。此书共分五个部分，即前期捻军领袖传、后期捻军领袖传、地方农民军领袖传、叛徒传和攻捻清将传，前三部分为正面人物传记，后两部分为反面人物传记。这每一部分又包括传记和附表两个类型，传记包括主要人物，附表包括次要人物，因为采用这种办法，可以把捻军的有关人物，几乎全部包括了进去。在书前，加写了一个较长的“绪论”，犹如全书的总纲，对于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，作了进一步的综合探讨，使全书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体系。又本书资料来源分为文字资料和调查资料两个方面，以文字资料为主，调查资料为辅，这两者互相印证，这样就使对于近百年来的这一伟大的农民战争的研究，不仅内容充实，而且也生动活泼，不至于使学术性著作过于枯燥。为了使读者对这次起义有更加具体的理解，书中增加了些地图，这些地图，都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提供的。在本书写作过程中，曾经得到一些同志们的帮助，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本书的写作，虽然费时甚久，但由于作者业已年逾花甲，
而又水平不高，难免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，希望同
志们和朋友们加以批评、指正，使它将来有机会再版时，予以
一一订正。

江 地

1983年12月25日于太原

山西大学历史系

绪 论

在十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间，中国大陆上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汉族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。

这次起义，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中间经过二十多年。起义从西南地区开始，逐渐发展到长江和黄河流域，后来一直扩展到西北和西南的边疆，席卷了中国大部分的省区。参加起义的群众，不仅有汉族农民，而且有回族、苗族、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。这次起义，虽然由于地区广阔，各地的经济状况、阶级构成、民族特点和宗教信仰又不相同，因而情况相当复杂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色，但起义的目标却是一致的，即都是为了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。这次起义，不是统一的有计划的发动，而是此伏彼起，陆续展开，反映了中国地方性农业经济的特点。在这些起义军中，声势比较浩大、地区比较广阔、时间比较持久、影响比较深远的，是南方的太平天国和天地会、中部的捻军、西北和云南的回族起义、贵州的苗族起义等。

在江淮之间起义的捻军，是这些农民军中重要的一支。捻军的前身是捻党，根据现有资料判断，捻党活动开始于1797年（清嘉庆二年），到1851年（清咸丰元年）转化为武装起义的

捻军，存在了大约五十余年。捻军起义从1851年开始到1869年（清同治八年）结束，时间是十九年左右。捻军起义失败以后，重新转入地下的捻党，又组织过小规模的起义，时断时续，一直存在到义和团时期。从捻党到捻军再到捻党，把这三个时期全部计算在内，则大约存在了一个世纪。捻军起义的地区，以安徽为中心，以山东、河南和湖北为外围，曾经到达过的省区，还有江苏、陕西、直隶（今河北）、山西、甘肃和四川，共计十个省的范围。捻军起义是太平天国的北方同盟军，又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承者，它推动了西北各省的回族起义，又是北方各省地方农民起义的组织者。这次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，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，因此，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。

捻军在起义过程中，锻炼出一批领导斗争的领袖，其中有些人是很有才能的将领，是中国农民战争中的英雄人物。在和捻军同时起义的地方农民军中，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领袖人物，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，也是值得称颂的。为了扼杀捻军起义，清王朝曾经陆续派出过众多清军将领，担任攻捻主帅，来扑灭这次起义。在这本书里，探讨了有关这次起义的正面和反面人物，为这些人物编写了或详或略的传记，正面人物包括捻军前期和后期领袖、地方农民军领袖三种类型，反面人物包括叛徒和攻捻清将两种类型。目的是要通过对这五种类型人物事迹的分析，来对捻军起义的进程及其历史作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探讨。

研究捻军史上正面、反面人物的事迹，研究这次农民起义的进程和历史作用，是有一定意义的。通过这种具体研究，可以看到中国农民战争产生、发展和败灭的一般规律，可以看到

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某些特征，也可以为历史人物的研究，提供相当的材料。在这本书里，以传记和附表两种形式，对有关人物进行了一个一个的解剖，并将他们的事迹分别列举出来。这里再进行一些综合的概括，提出有关他们的共同特征，来加以探讨。

首先，说捻军领袖的特征。

一是出身贫苦。捻军领袖除张乐行、张宗禹等少数人以外，绝大多数出身贫苦，是农民中最受剥削和压迫的贫雇农。他们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有的人是孤儿，有的人讨过饭，有的人当过雇工、樵夫、渔民、船夫。他们中间最好的职业是小手工业者和小贩，最坏的是连年乞讨，根本没有任何生活和生产资料。就是这种穷困饥饿的生活，积累了他们对于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仇恨，为了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，才不得不奋起反抗，给予反动统治以猛烈的进攻。

二是举家从军。淮北农村不论男女老幼、父子兄弟，常常一律结捻起义，举家从军，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情况基本相同。张敏行和张乐行是兄弟，任乾和任化邦是叔侄，李大喜及其子李成、其孙李帛，祖孙三代都是捻头。张乐行之妻杜金蝉，刘永敬之妻蔡鸾英都是女领袖。家族和亲友是结捻的纽带，村庄和圩寨为领旗的单位，起义就这样由家族到村庄，由村庄到州县，逐步扩大和发展起来。捻军还是半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，农忙时在家种田，农闲时出外打粮，出征是军队，归来是农民，男子远征作战，妇女和儿童保卫圩寨。所谓“捻以走为业，蒙（城）、毫（州）、曹（州）、鄂（城）之为首者，

大率亲族男女偕行，穷年奔窜，练成滑劲。父兄死而子弟代，若世守家法然。”^① 所谓“（捻）起于皖北颍（州）、寿（州）、蒙（城）、亳（州）之间，有庐旅，有妻孥，……子弟父兄相率为盗，私立名号。”^② 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个特征。

三是游民气质。从《清实录》里可以看出，游民阶层在白莲教起义（1796年——1804年）前后，随着清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，开始大量的出现。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，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多，一般聚集在商业城市和运河两岸的交通线上，组成庞大的失业队伍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后，游民阶层分化，一部分参加农民军，一部分参加湘、淮军，各省清军和团练。在战争初期，他们的影响还不显著，到战争后期，他们的影响开始扩大。从农民军方面看，是军纪败坏和叛变现象严重；从清军方面看，是哗变丛生，溃勇成群。在捻军里，游民有一定数量，部分领袖具有游民气质，他们操过不正当的职业，有过不正当的行为，如象盐枭、兵勇、保镖、拳师、衙役、乞丐、小偷、流氓和强盗等。捻军里曾经发生过的军纪废弛、抢掠财物、大吃大喝等现象，是这批人干出来的。反复无常、动摇变节、叛变投敌等卑鄙行为也是这批人干出来的。

四是眼光短浅。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决定了捻军领袖一般眼光短浅、缺乏深谋远虑。初期只为打粮，后期只顾奔窜。占领过若干城市，但只为财物，掌握过许多圩寨，但只图做个圩寨主。张乐行责备他的部属是“乃各思苟安之计，回家

① 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朋僚函稿，复应敏斋观察，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八日。

② 《山东军兴纪略》，卷二之上，《皖匪一》。

固守土坯，徒知抢掠，利己之私，久则足以自毙。”^①但他本人据说也是“好利逐末”之徒。^②他号召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是，成功之后“斯时论功酬勋，裂土建封，光耀门闾，坐享无穷之福，岂不美哉！”^③农民虽然是一个革命的阶级，但它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，没有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，所以，在意识形态方面，也仍然是陈旧的思想体系。马克思说：“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，就把它设想成税吏。”^④淮北农民当时设想的魔鬼，是酷吏、衙役和地主。因此，在张乐行的起义“檄文”里，虽然说到起义的原因是酷吏的贪赃枉法和地主豪绅的压榨剥削，却没有指斥整个清廷王朝，没有联系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革命，仅仅局限于淮北地区的狭小范围，说明领袖们的眼光是短浅的。捻军起义虽如暴风骤雨，但却分散松弛，因而一经僧格林沁有组织的军队进攻，随即土崩瓦解，溃不成军。农民的力量虽然巨大，但是，“他们需要更集中、更开化、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。”否则“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，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，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，这一点也同样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。”^⑤

五是英勇机智。因为受剥削受压迫最深，起义以后又得到了军事斗争的锻炼，所以捻军领袖中有的人英勇善战，有的机智多谋。在前期，张乐行以“善战”闻名，龚得树以“善谋”

① “张乐行檄文”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62年10月10日。

② 《涡阳县志》，捻军，第二册，第108页。

③ “张乐行檄文”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62年10月10日。

④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7卷，第94页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。

⑤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18卷，第13页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。

闻名。在后期，赖文光和张宗禹以“善谋”闻名，任化邦和张禹爵以“善战”闻名。关于捻军领袖这一特色，李鸿章曾经说道：“……伪鲁王任柱等系蒙、毫捻首，伪遵义赖文光系粤逆余党，任柱马步贼为最善战，赖文光为最善谋，两逆狼狈相倚，固结不解。”^①又说道：“（任化邦）骁勇善战，项羽之俦，人中怪杰也，吾与将士不幸而遇此磨难。”^②他还说：“张总愚（宗禹）掳马数万，横驰畿南……乃天下至无赖子，老亮绝非敌手，……（左宗棠常常以诸葛亮自比，给人写信，自署老亮。——引者）”^③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在生前斗争坚决，英勇顽强，而且在起义失败以后，又能视死如归，英勇就义。袁甲三在其奏折中说过：“每见巨恶临刑，恬无惧色。”“（捻首）总以能聚众为强，不怕死为荣，每遇行刑，谈笑歌舞，既不畏朝廷之法，也不恋骨肉之情。”^④这种豪迈的英雄气概，既表现在最高领袖身上，也表现在普通战士身上，袁甲三在这里指的是普通捻首，著名领袖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六是以人成军。和举家从军的特征相联系，捻军是以人成军，人存军在，人死军溃，领袖具有决定作用。入捻是应捻头号召，是因亲戚朋友而来的，捻首往往就是本圩寨或本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物。因此，军队只服从组成此军的首领。领旗是以圩寨为单位，编制同样具有地方色彩，大旗头、小旗头都是本地人物，因而首领是全军的灵魂，是组成军队的核心，首领死亡以后，军队失去联系中心，随即溃散。在初期，由于侯士

①《太平天国》，第2册，“李鸿章奏稿”，第865页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。

②转引自罗尔纲《太平天国史稿》，第435页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
③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朋僚函稿，复陈作梅观察，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六日。

④袁甲三《端敏公奏议》卷2，第39页，项城袁氏家集本。

伟早死，红旗捻军就未能发展起来。蓝旗捻军实力最强，但因韩奇峰早死，刘永敬被杀，遂使此军溃散，投敌变节者甚多。在后期，东捻军主力是任化邦从皖北带出来的“蒙、亳之众”，任化邦死后，东捻军也就溃散，随赖文光强渡六塘河南下的不过千余人。反之，西捻军的张宗禹是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的，因为有这位领袖在，全军始终团结在他的周围，一直战斗到底。这说明，因人成军的捻军，首领是全军的决定性因素。

其次，说地方农民军领袖的特征。

捻军战争时期，江北的地方性农民起义，是围绕着捻军起义，以捻军起义为中心的。这些起义的性质、特点、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等，基本上是以捻军为榜样而组织起来的。有的起义是在捻军的影响下爆发的，有的起义是在捻军的推动下发展的。这些农民军大抵和捻军同起同灭，命运相同，息息相关。他们和捻军的关系是分支和主干的关系，类似外围武装，实质上构成捻军起义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把地方农民军领袖的传记，作为捻军人物传记的组成部分是适当的。地方农民军领袖的特征和捻军领袖的特征也是大同小异。这里同中求异，只谈几点相异之处。

一是知识分子增多。从出身来说，除了有些领袖和捻军领袖一样，出身也很贫苦以外，部分领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。幅军的刘淑愈是进士，李宗棠是廪生；淄川军的刘德培和司冠平是秀才；黄崖事变的张积中，还是太谷学派的学者。在地方农民军中，有一些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之类的人物，这类人物在捻军中却是绝无仅有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参加起义的知识分

子多起来了？因为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动晚于南方，到太平天国已在南京建都，捻军已在淮北起义，江南半壁河山已为农民军控制的时候，北方各省才开始了起义。这时，革命运动已经深入，革命形势正是高潮，就在这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候，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分化。如所周知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，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，他们的阶级地位分别属于其所服务的阶级。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，知识分子多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，通常依附于官僚地主阶级。但是，当革命的风暴到来时，这种情况就要发生变化，其中少数人会转到农民起义方面来，参加抗清运动。因此，在北方农民军中，不仅有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参加，而且有和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大知识分子参加，难怪乎当时统治者中就有人大叫“非常变故，深为骇叹”了。^①

二是“盐枭”增多。“盐枭”也是当时严重社会问题之一，《清实录》里记载颇多，他们起初大抵结邦贩运私盐，后来携带武器走私拒捕，逐步发展成有组织有首领的武装，既保护私盐贩运，也打击官府和地主豪绅。咸丰间，山东、河南农民开始起义，他们也组成了抗清的武装，清统治者称为“枭匪”，我们可以名之为“盐民军”。盐民军活动地区是鲁北（武定）、鲁西北和冀鲁豫边区。清统治者描绘他们的活动是：“均执黄旗，头扎红巾”，“徒步队以潜踪，冲马队以救死，是其惯技，且皆马贼，飘忽狡悍，每日可驰一、二百里，每夜住歇必数徙其处，剿之不及剿，防之无可防。”^②因为主

① “闻敬铭与单为总书札”，《山东近代史资料》，第一分册，第143页。

② 《东昌军中牍稿》，见江世荣编《捻军史料丛刊》，第三集，第310页。

要是骑兵，官书中又称之为“马贼”。这是一种尚未成型的起义军，类似小股游击队，主要活动是击杀弁勇，焚烧衙署，捕捉官吏，攻掠地主，他们打乱了清朝在北方的军事部署，曾经配合了太平军北伐和捻军作战。1865年（清同治四年）东捻军进入山东，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军数千往鲁北剿“枭匪”，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大名防“马贼”，说明他们具有一定力量，对全国抗清运动有着支援作用。在刘长佑的《刘武慎公遗书》、龚易图的《东昌军中牍稿》、余荣的《癸丑日记》里，^①都留下了这方面的史料，是一个值得注意探讨的问题。

三是宗教色彩。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，宗教的产生和发展，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状况、经济关系所决定的。宗教表象的种种变化，来源于阶级关系的不同。同一的宗教，虽然有时为社会各阶级各民族所信从，但往往随着不同的阶级和民族，采取着不同的形式，改变为不同的内容。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作愚民的工具，农民也利用宗教作反抗的工具。宗教在农民战争中起了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，神秘的预言加强了农民起义的信心，教徒的联系是发动群众的纽带，符咒神灵之说增加了战斗的勇气，朴素的理想和朦胧的观念，也多半藉宗教的外衣而表现出来。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农民战争是利用过宗教的，如东汉末黄巾起义利用过道教，北宋末方腊起义利用过摩尼教，元末韩山童、刘福通起义利用过白莲教等。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前，全国有三大反清组织，即北方的白莲教，中部的捻党和南方的天地会。起义开始以后，北方农民军有相当一部分属白莲教系统，中部农民军基本上属捻军系统，

①《癸丑日记》为手稿本。

南方农民军基本上属上帝会和天地会两大系统，陕甘和云南的起义军基本上属回教系统，就全局来看，宗教色彩是相当浓厚的。北方农民军具有宗教色彩的，是鲁西北白莲教军，山东邹县文贤教军，河南商丘金楼寨军。在这些农民军中，教主一般就是起义首领，还有些宗教的仪式和信条，有时还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，目的在于藉虚幻的天国的形式，来达到现实的目的。宗教在捻军战争时期的北方农民军中，曾经是发动抗清起义的工具，它在这次斗争中起过相当的作用。

四是斗争形式多样化。这表现在：有的用捻军名义，如河南南阳角子山起义，豫南陈大喜起义，都与淮北捻军主力同名义；有的用宗教名义，如鲁西北农民军，河南商丘金楼寨军，山东邹县农民军，都用白莲教及其支派名义；有的以反清组织为基础，如幅军来源于幅党，捻军来源于捻党，起义前已有组织基础；有的由团练转化而来，如长枪会军，联庄会军及淄川军，起初都采用合法形式，后来才转变为起义武装；有的以群众性“抗漕”为先导，如河南和山东的某些起义军，是在请愿抗漕、围城杀官、抗粮杀差的基础上组成军队的；有的是利用河湖便利条件，掌握相当船只，进行水上活动。如洪泽湖、微山湖和黄河、运河交叉点上的“水套”区，都是农民军的活动地点；有的是利用深山丛林，悬崖绝壁，进行山上活动，象邹县尼山、费县云谷山、南阳角子山，都曾是农民军的基地；还有的农民军是由“溃勇”组成的，象清朝江北大营、湖北“鄂军”、湘系鲍超“霆军”，楚系刘松山老湘营，都曾发生兵变，规模较大的兵变，常常左右着战争的局势。由此可见，北方农民军领袖有团练首领、宗教首领、抗漕首领、变兵首领以及“盐枭”首领。产生这种多样化斗争形式的原因，是因为地